

# 以家乡为骄傲 以荣誉为起点

## ——访启东籍新晋中科院院士、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顾东风

本报记者 陆一冬 戴丽丽

桌子上、窗台上、书柜里,到处堆满了书籍和资料。阜外医院行政楼里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,与其说是办公室,不如说是书房。11月30日上午,记者见到顾东风时,他刚刚结束一个会议,理性、直接,待人温文尔雅,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顾东风给记者的第一印象。

从一名普通的机修工,到心血管疾病防治专家,再到中科院院士,顾东风完成了人生中高难度的三级跳。而支撑他跳跃的动力,源于对医生这一职业热爱,对医学科学的不懈追求。

### 差一点失去上高中机会

1958年,顾东风出生在启东志良中央镇的一个普通家庭。兄弟姐妹六个,顾东风排行老五,是家中的小儿子。“小时候,见到镇上医生穿着白大褂,背着医药箱为居民看病,很是羡慕。”再加上大哥大嫂都在乡卫生院工作,潜移默化中,顾东风对医生这一职业充满了向往和崇敬。

1972年顾东风初中升高中,由于当时不合理的考生推荐制度,他被排除在高中考生名单之外。临近考试,经好心人帮助,好不容易从乡里争取到一个临时指标,他才急冲冲地奔向8里外的考场,参加了升学考试,最后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学习。“差一点我就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。”从此,顾东风异常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。

从竖河中学高中毕业后,顾东风被分配到了当年的吕四机修厂当学徒工,每周三班倒上班。在工厂,顾东风接触了一些技术员,对他们技术指导很佩服,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。

不久,县工业局要发展“高技术”企业,从北京、天津挖了数位技术人员来启东,开发电器产品。经过推荐和遴选,顾东风被调到启东电器厂,后又赴上海电子管厂学习技术。

1977年恢复高考后,为顾东风打开了通向大学学习的希望之门,他白天在工厂上班,下班后读书。凭着苦学和智慧考上了南京医科大学。

进入大学后,顾东风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,5年的时间,他从宿舍到教室、图书馆和食堂,基本上是四点一线,无暇他顾。在文革中未能有机会打好英语基础,家乡口音又重,大学初期他用中文标注英语读音,

课余刻苦自学。

大学时期,顾东风掌握了基本的临床和预防医学知识。临近大学毕业,他深感医学知识匮乏,需要进一步深造。

1983年,顾东风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,开始主攻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和防治研究。1990~1992年,他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,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二波“出国潮”,大批科技人才赴海外谋求发展,和顾东风同一批出国的人,绝大多数留在了国外。

“我也有过留下来的想法,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国做点事情。”1993年初,顾东风回到北京。

刚回国时,顾东风居住在简易的“筒子楼”里。谈起那段“艰难时光”,顾东风笑笑说,要说一点困难没有也不是真话,但工作很忙碌,大部分时间都在单位和调查现场度过,也没觉得有多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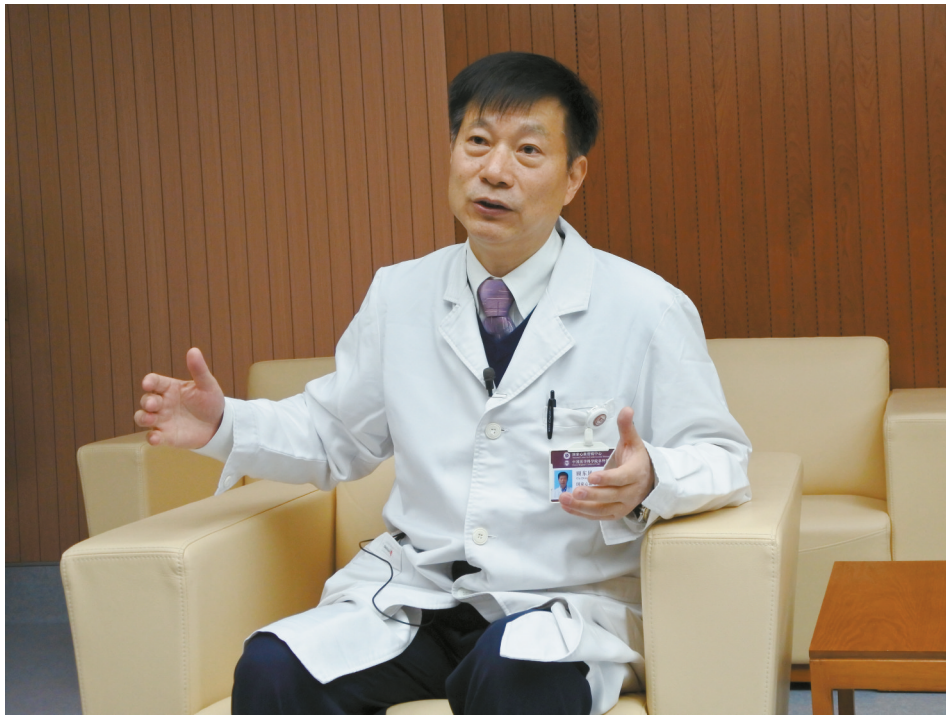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为百姓提供更实用的防治模型

“心脏像汽车的发动机,血管相当于油管,油管堵塞,心脏、大脑等器官就会出大问题,我们所做的模型就是预测这些问题。”顾东风向记者展示心脑血管风险APP使用方法,在手机或电脑上输入年龄、总胆固醇、糖尿病等指标,并结合中国特色的地域、腰围、心血管病家族史等综合指标数据,便能够借助数学模型,预测这个人十年内发生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心脑血管风险,并根据风险高低提供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,如早期改变生活方式等。

冠心病和脑卒中,是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威胁。然而,目前关于心血管疾病(AS-CVD)发病风险的预测模型多来自欧美人群,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。为了开发和验证首个适用于我国人群的ASCVD发病风险预测的“中国模型”,顾东风进行了跨越20年的大规模调查和系统研究。

1991年10月,阜外医院牵头完成我国第三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的现场工作,并由阜外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负责汇总。作为研究室主任,顾东风参与整理和撰写了题为《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和变化趋势》的重要英文学术论文。

1997年,为研究我国心血管疾病的致病因素和流行趋势,顾东风主持开展了重要科研项目“中国冠心病、脑卒中发病和死亡影



顾东风在阜外医院会议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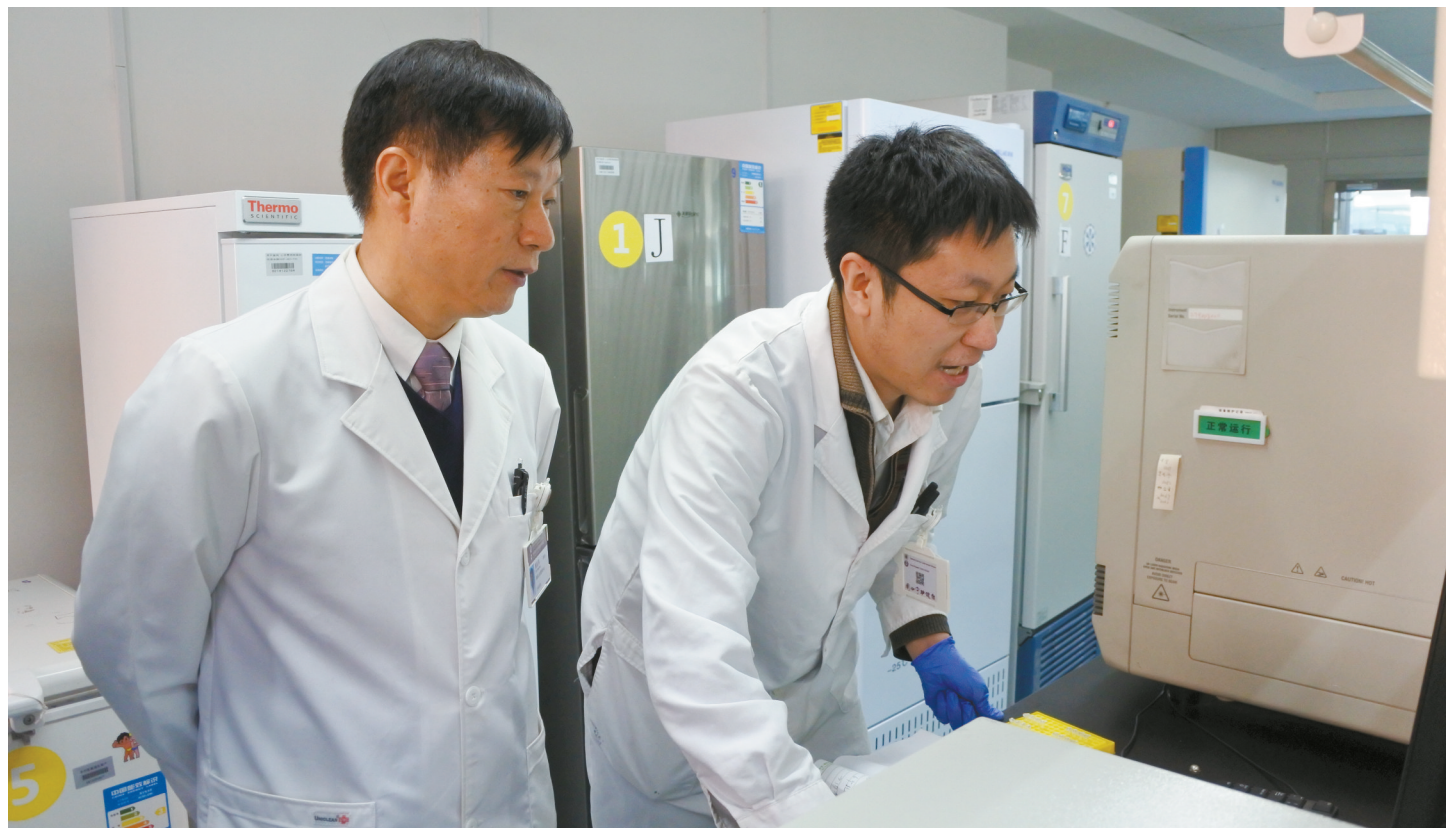
响因素的前瞻性研究”。

该项研究需要对1991年高血压调查的20多万人进行大规模随访。刚开始,研究就遇到了许多挑战。首先是时间比较久远,没有电子数据库,档案收集起来难度较大。

“有的人已经退休或者去世了,档案没有继续保存。有些地方遭遇了洪水等自然灾害,档案遗失了。”顾东风说,这些样本资料对于研究我国疾病谱的转变、心血管等重大慢性病负担和发病死亡影响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“当时,我每天想得最多的事,就是如何把这些资料从全国各地搜集过来。”顾东风说。除了寻求卫生部、医科院和地方卫生局等部门的支持外,顾东风在美国校友何江教授的帮助下,成功地从美国心脏病学会申请到了宝贵的启动经费。

与此同时,顾东风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,通过帮助组织翻译最新《国际动脉粥样硬化防治指南》和编撰印刷《高血压防治手册》等方式,又从国内一些医药公司筹到了部分研究经费。



顾东风在心血管病防治实验室指导学生开展科研活动

就这样,顾东风带领科室成员和全国近20个合作团队克服重重困难,历时4年共搜集了17个省市近18万人的调查材料。材料搜集回来后,顾东风聘请资料输入员用了近3年时间将资料录入计算机。同时,还组织专家审核搜集回来的调查表格,对调查对象的发病诊断和死亡原因进行核实。经过不懈努力,调查研究的成果陆续发表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《柳叶刀》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等全球医学领域权威学术期刊,揭示了我国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主要发病和死亡影响因素,推动了我国心血管病等慢性疾病的防治。

在此基础上,2016年,顾东风领衔的团队,顺利完成了中国心脑血管病风险预测研究(China-PAR)。这一研究成果在著名国际医学期刊《循环》杂志发表,杂志主编采访并配发编者按,高度评价该研究有助于促进心脑血管病预测和防控。随后开发了手机APP软件和心脑血管风险评估网页,方便广大民众使用。

心脑血管风险APP一经推出即受到了社会欢迎,有不少企业与顾东风接洽,希望能进行商业合作,但他都拒绝了。“这项研究是国家出资进行的,我们就应该无偿提供使用权,造福更多老百姓。”顾东风告诉记者,目前,他和团队正在不断丰富这个模块,以期为老百姓提供更加实用的预测模型,让心脑血管风险APP更接地气。

经30多年的坚持和努力,顾东风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270多篇学术论文,获得国家15项发明专利授权,以第一完成人获得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,成果被写入30多项国内外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等,被195部国际专著引用,在国内外心血管与慢性病防控领域产生重要影响。

### 让敬业与仁爱精神薪火相传

初冬的北京,蓝天如洗。位于门头沟的阜外医院西山科研基地内,“国家心血管病中心”几个大字熠熠生辉。这里,也是顾东风的心血管病防治实验室的所在地。

中午12点,A座三楼的实验室内,顾东风正在跟助理研究员李宏帆商讨最新的研究进程。隔壁的办公室桌上,一份盒饭静静地等待着它的主人。

“教授一忙起来就时常忘记按时就餐,我们都习惯了。”阜外医院助理研究员杨学礼说。顾东风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,白天处理行政事务,晚上还要进行科研工作、指导学生,40多岁时就有了许多白发。

12时30分,顾东风匆忙回到办公室扒了口饭。10分钟后,他又召集同事和学生开会,总结前期工作,安排下周任务。

除了带领团队做科研项目外,顾东风还担任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、医院副院长、流行病学部主任等多个职务,同时还担任国内外多个学术兼职。而众多的头衔中,顾东风最重视的还是“导师”这一角色。

多年来,顾东风培养的学生工作于国内外医学及相关领域。学生们有的已成为教授、学科带头人,角色在转变,但精神的传承没有变。”鲁向锋说,“顾教授治学严谨,对学生要求严格,执着于科研,身先士卒,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,学生们也跟着一起干。”

医者仁心。顾东风作为主管阜外医院教育处的副院长,总是对学生这样说:“当大夫要有敬业仁爱精神,做好人;做研究要实事求是,不能有半点虚假,才能做好学问。”

阜外医院第一任院长吴英恺院士是顾东风最为敬佩的前辈之一。吴英恺是中国胸心血管外科和心血管病流行学的奠基人,在医疗、科研、预防、教学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“翻阅吴院长八十年代发表的流行病学和防治英文论文,你能感受到大医为民解除病忧的情怀。”顾东风激动地说,“作为后来人,我们要牢记和传承前辈的初心,沿着他们的道路砥砺前行。”

“每次看到学生学有所成,发表优秀论文,或接到学生们从天南地北送来的祝福,就特别高兴。”顾东风说。从青年人身上他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,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青年学者,让更多的年轻人脱颖而出,让敬业与仁爱精神代代相传。

### 希望有机会回报家乡人民

“我是土生土长的启东人,能够获得科技界的最高荣誉,离不开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和培养。”顾东风说,获得中科院院士的消息传出后,除启东市的党政领导外,不少家乡老同事、老朋友也纷纷来电或短信祝贺,让他很感动。

“初中时,我是居民户口,父母再加上六个孩子,不到月底,家里的米缸就剩下一个底,大家就勒紧裤带少吃一点。暑期时常去捡柴禾或割猪草。”回首自己的学生时代,顾东风感慨万千。

虽然条件很艰苦,但年少时的日子却充满乐趣。无论是小学、中学,很多老师给了顾东风人生最早的启蒙,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至今他仍能清晰地叫出许多任课老师的名字。“除感恩父母养育和培养外,我感恩于这些家乡老师,是他们引领我走上了学习的道路。”

“我以家乡为骄傲,启东有很多更为杰出的人才,我只是比他们先获得荣誉而已。”顾东风表示,“院士”这份荣誉是对他和团队过去工作、成绩的肯定,也是国家、中国科学院及所有同行对他的一个新托付,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。

这几年回启东,顾东风总是为家乡的巨变而振奋。“启东这几年生活条件好了,水质好了,流行病也少了。基本公共卫生方面建设搞得有声有色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”他说,启东市人民医院、中医院这两年不断加快发展,医疗条件有了明显改善。

顾东风认为,许多常见疾病还是在基层医院得到解决,像心脑血管疾病通过预防、早期筛查和针对性的防治,可以得到较好的控制。因此,他希望今后能抽出时间,对启东市民的心脑血管病进行研究,跟基层医务人员交流,指导心脑血管病防治工作。把预防和防控方案、价格低及效果好的药品推介到乡村卫生室,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。让农村的心血管病得到更好防治,造福家乡人民。

### 看似柔弱却坚强(三) 潘兆平

知道我孙子4岁已上托儿所学前班,问我:“他赖学吗?”我说平时还好,天若下雨什么的就赖着他爸开车送。杨先生说她小时候也赖过学,当时家里的东西两头各有一所小学,她在东头上学,很受老师宠爱,是“公主”,后来不知何故,家里将她转至西头去上学,是插班生,更主要班里有几位王子与公主(是富人或官家子女),杨绛感觉受到冷落,每天早上就赖在门洞里不肯去上学。最后由强壮的马车夫“一把掬到肩上就扛走了”,我问:“你哭吗?”“哭也没用。”

杨先生平时讲普通话,与亲戚讲无锡话,我去了,她就说:“兆平来了我顶开心,我可以讲上海闲话了。”也许上海话能让她回忆起当年青春的岁月。另外,很多沪语的精妙之处是普通话难以表述的,例如上述的“趣”,还有钱先生的“常委常委,常常勿开会”。上海话把“大”说成“DU”,百岁杨绛还顽皮地给人起外号(并无恶意)。她称某位常去拜年的领导“DU好佬”,称某领导“DU老信”,这类称呼对南方人而言还有些亲切之感。有次我向她钱先生对陆游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“招牌菜”《示儿》似不太欣赏,不知何故,是否认为文学品位不高,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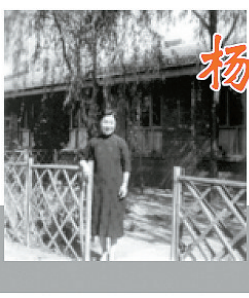
点打油诗风格?杨先生莞尔一笑:“说DU话呀!”

有年春节去拜年,看到她客厅桌子上新添了一盆硕大无比的君子兰,我指了指花:“DU好佬过来了?”她点点头,然后两人就笑,因为这些外号只有我们两人知道。

有一次杨先生满含歉意地对我说一件趣事:“DU好佬”突然来访,不巧那天保姆正外出购物,杨先生耳背又在内屋休息,所以再三摁门铃仍是不得而入,只得废然而归,择日再来。

“DU老信”见纸上有不少杨先生写的字,就拿起来说:“我拿回去做个纪念……”不料杨先生敏捷地夺回了那张纸说她自己要留着的。事后她得意地对我说:“其实她前脚刚走,我后脚就撕掉了。”对于那位“DU老信”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关怀与爱护,杨先生是心存感激之情的。她之所以夺回并撕碎那张纸,主要是不愿意自己那已是歪歪斜斜的字流落在人间。

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出版后,照例杨先生赠我一本亲自题字的精装本。我捧着书致谢,她指着封面问我:“这几个字写得怎样?”我说:“挺漂亮,不过好像增添了一点硬体字笔法。”她嗔嗔地对我说:“近来我撒



## 杨绛: 永远的女先生

周韵隆 主编

了个谎。”原来有位官员,突发雅兴,要搜集名家墨宝,杨先生荣列名单之中。几次递话过来,杨先生始终推诿拖延,后来干脆派人上门索讨。杨先生说自己手痛已久不写字,仍是不从。不料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即将出版,出版社希望杨先生亲题书名。正在“手痛”的先生只得写了书名。事后有些忐忑,觉得对他人撒了谎心有歉意。我说这不是重大的政治问题,人家不一定会介意,更不会深究此事。如果真有不知趣的,登门要讨个说法,你就理直气壮地讲,书名是在手痛之前早已写好的。先生想了想,觉得我这个谎编得还较圆,笑着点点头:“蛮好!”

钱锺书先生把自己比作一块臭肉,知道会有苍蝇来下蛆。杨绛先生走了,钱先生

肯定会说:“又多了一块臭肉。”听说杨先生刚走不久,有关她的传记已经应运而生,还是得到杨先生“生前亲自审阅”的,似乎是“死无对证”,谋划之深,出手之快,令人叹为观止。其实真正被杨先生认可的带传记式的书只有一本,就是吴学昭先生所著《听杨绛谈往事》。该书出版后,杨先生赠我一本并说这本书最后定稿时,“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校核的”。

后来我与她谈及此书,说其中不少照片从未见过,弥足珍贵。杨先生指着一岁半时母亲抱着她的照片神秘地说:“其实这张照片是三个人。”原来那时她母亲已身怀六甲。身上杨先生说:“妈妈抱着我,我坐在弟弟的身后,我是压迫者。”

“我们仨”走了两个人以后,杨先生已经完全“视死如归”了。她说最怕瘫在床上,自己受罪,别人受累。所以称自己心脏有点毛病是“宝贝”,到时候一下子去了,多好。百岁以后老人日渐衰弱,其间我有两次出国探亲半年,告别时握手依依,有一种诀别的心酸。她送我到门口,我再三叮嘱:“好好地(活着),等我回来看你……”每次回来,未等倒好时差,就拿了美国杏仁、巧克力去看她,她百岁之前还爱吃坚果。去春

回来,拿了“全家福”给她看,因为巍儿自小受钱、杨两位的喜爱,杨先生颤巍巍地指着潘巍问:“是你女婿吗?”我没有女儿,哪来的女婿?我笑不出来,心中隐隐难过。

老人日见衰竭,听力几乎全失,说话也很吃力了。后来去看她,两人手握手坐在沙发上相视而笑,她的双手已经骨瘦如柴,但肌肤柔润依旧。

4月份在网上得悉,钱锺书先生《外文笔记》已全部出版,顿感又喜又忧。忧的是杨先生“打扫现场”最后一项重大工程圆满完成了,作为支撑她生命延续的精神支柱突然消失。她的生命之火灭了,她还能再坚持多久?无情的现实证明,我的担忧不是多余。

5月24日,网上已传成一片“杨绛病危”并有许多为她祈福的帖子,次日下午二时许,接朋友短信:“惊悉杨绛先生去世……”愕然。杨先生去世十天了。十天以来夜间难以入睡,四十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片段,过电影般地在眼前展现,上述内容,都是片段的摘录,有点杂乱,但句句真情。愿先生走好,到了那边向钱伯伯、圆圆姊问好。等到他日我们的灵魂在天堂相见时,再继续咱们永远快乐的聊天。

(二十)